

原始積累與發展模式

——對〈危險的第一級火箭〉的省思

● 王家英

卞悟的〈危險的第一級火箭〉(第18期, 下稱〈下文〉)是一篇既尖銳而又富爭論性的文章。尖銳的是其鋒利的文字赤裸裸地展現了中共官僚體系的貪污結構與經濟改革的共生關係; 而富爭論性的是其對原始積累的看法及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類比。對於前者, 筆者認為它的分析鞭辟近裏, 難以置喙; 本文要討論的是後者, 亦即是原始積累的意義及中國發展模式的性質。

原始積累是否 等同於官僚資本?

首先, 在專制政治的條件下由公有化計劃經濟過渡到私有化市場經濟, 原始積累是否必然等同於官僚資本? 這是一個相當決定性的問題。因為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話, 中國整個改革便只能是官僚權貴利益的化身, 它不單變得毫無意義, 在道德上更會被千夫所指; 相反, 整個問題便變得相

當複雜, 在批判官僚資本的同時, 或許要顧及原始積累的其他面向。

對上述的問題, 〈下文〉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官僚資本「說得明白些實際上就是原始積累」: 「官僚資本的原始積累由於完全建立在政治特權干預下的不平等(起點不平等, 規則不平等, 機會不平等)競爭的基礎上, 因而其前資本主義或中世紀的野蠻色彩就更為突出。」照〈下文〉的看法, 原始積累就是官僚資本, 而官僚資本是在經濟發展初期, 專制政治體系中的官僚憑其本身的權力關係積累的第一筆資本。這樣的解釋顯然帶有嚴重的化約主義毛病, 忽略了原始積累作為一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之間複雜的過渡性現象。要了解這一現象, 我們還得回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裏。

馬克思認為, 在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存有一過渡階段, 此階段即為原始積累^①。據他的分析, 原始積累包含財富積累與無產化兩大元素, 缺一不可。財富本身並不等於資本。資本是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

對馬克思而言，單從財富積累本身是不能說明原始積累的。在財富積累的同時，必須將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係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係，並建立資本主義所需的市場及法律秩序。

的某種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其中包括勞資關係及規範勞資關係的各種市場及法律制度。所謂勞資關係是指擁有不同性質商品的兩種人——一種人一無所有，只得把自己的勞動力當成商品出售；而另一種人則擁有所有生產資料(財富)，並希望藉購買前者的勞動力從事生產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的關係^②。這種關係是受到市場規限和法律保護的。對馬克思而言，單從財富積累本身是不能說明原始積累的。在財富積累的同時，必須將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係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係，並建立資本主義所需的市場及法律秩序；前者旨在釋放勞動力予資本主義生產，後者旨在確保資本主義生產順利進行^③。

為了批判中共官僚體系的貪污結構而凸顯官僚資本在原始積累中的重要性及野蠻性是無可厚非的；但將官僚資本等同原始積累則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資本之餘一併否定原始積累。無疑，在過渡到資本主義市場化經濟的原始積累過程中，由於牽涉到舊制度的破除和新制度的建立，當中

常常出現許多非理性、非人道現象。更由於此過渡是在一歷史罕見的全權專制政體中發生開展，這些非理性、非人道現象更因權力的因素而進一步受到扭曲。然而，在批判權力與資本結合之餘，我們必須肯定原始積累的成就及方向。官僚資本只是中國過去十多年間整個原始積累的一部分——或許是一很重要而又是我們不願意看見的一部分，但原始積累亦同時帶來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市場化、個體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資本流動加快、整體社會生產水平提高、民間資本上升等，這些都是原始積累的正面現象，需要積極地予以肯定^④。

社會穩定是 經濟持續發展的條件

從現實的角度看，中國過去十多年經濟發展的最大優點，無疑是它「改革」的特性：它避過了暴力「革命」，特別是因暴力革命翻倒了的社會結構及可能由此衍生的長期社會不穩。眾所周知，社會穩定是任何長久持續的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這一點，中共以其強大的國家威權體制推動經濟改革，不論是內外形勢使然，還是中共本身「先知先覺」^⑤，相對於革命所可能帶來的翻天覆地變化(如大量暴力、流血、破壞、失序)而言，大概可算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較平實、較少代價的起步。

較少只是相對地說。絕對的代價並不一定少，以威權體制進行經濟改革的優點也正是其弱點，這情形尤以中國為然。由公有化經濟過渡到市場化經濟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掌控全國政經大權的中共各級官員幹部，明顯



站在最有利的「利己」地位，因為他們不但因公有制而控制了整體社會財產，亦控制了將這些社會財產私有化、股份化及市場化的決策機制、資訊及速度。在「人心為己」的普遍原則下，這雙重控制必定帶來整個國家官僚體系的全面腐化（如〈下文〉所描述的掌勺者將大鍋飯扒到自己的盤裏），後者又會倒過來阻礙市場化的發展，甚至激化社會矛盾，造成各類大小型的社會動亂。

上述現象的現實性和迫切性，正是〈下文〉的關注點。擺在我們面前的彷彿是一個難以解開的困境：以專制政體展開原始積累避開了革命的破壞性及不可測性，但專制政體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形成的權力資本結構又可能反過來打斷原始積累。

筆者並不認為已擁有解開這困境的簡易方法，亦不相信有這種簡易方法。但在思考出路時，有一個前提必須予以肯定，即要走向發展，原始積累必須繼續。肯定這前提的原因來自宏觀的考慮：原始積累的持續進行，終將導致市場及法治制度的建立和個體化的全面展開，而這均對官僚體系的結構性貪污有抑制以至清除的作用。

稍翻人類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上，從來就不曾完全排除非理性、非人道現象，馬克思甚至以「聲名狼藉」、「血與火」來形容這過程^⑥。事實上，由英國到美國、由歐洲到美洲，野蠻、暴力、貪污等非但未曾離開過這些地方的原始積累，也未曾離開過它們早已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唯一分別的，只是後者較前者能理性地對待這些現象而已。原始積累的目的，便是要建立這較為理性而又具自我成長能力的社會經濟

制度。

這裏絕對無意替中共專制政權的制度性貪污作任何理性化的解釋。筆者想強調的是在新舊交替的原始積累過程中，非理性現象是無法完全排除的，中共的情況之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為原始積累的起點不是歐洲的封建社會、美洲的殖民社會或台、韓的後殖民社會，而是經歷近四十年公有化的共產社會。前者在個體化、私有化、市場化、法制化方面或多或少已有所建立，對權力與資本的結合總有一點抑制作用，而後者卻從零開始，官僚的權力在毫無阻擋之下便很容易變得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了。

然而原始積累一旦開始，即會慢慢釋放出各種社會力量，從而對貪污的官僚體制進行批判、反對，以至改造、轉化，而今天我們的批判恰恰部分地扮演了這種功能。事實上，原始積累就是各種社會力量交拚的過程。這些社會力量包括仍守護着舊社會特權利益的舊官僚，在原始積累過程中藉政治特權發家致富的新權貴，憑才幹實力或各種關係冒起的新中產階級及資本家，私有化後的小農階級，因社會結構改變而失業或貧窮化的無產階級……。從這一角度看，〈下文〉將這些社會力量類分為保守派、改革派和民主派雖能凸顯政治上的某些矛盾，但對了解中國複雜的社會現實仍不免失諸簡化。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社會分子或許在相同的利益下結盟，但亦會因不同的利益而分化。改革派會因保有既得利益而變得保守；保守派亦可因預見的利益而變得激進；民主派會因招安而成為改革派；改革派亦可能在權力鬥爭失敗後變為民主鬥士。受到官僚特權剝削欺壓的各利益團體可能會聯合起來反對貪污專制或

稍翻人類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上，從來就不曾完全排除非理性、非人道現象，馬克思甚至以「聲名狼藉」、「血與火」來形容這過程。

宏觀而言，原始積累必會導致行動者對自身權利的全面覺醒，而覺醒後的行動者只要認清現實，在能掌握的條件下(不是盲目地)盡量推動專制政體的改造與轉化，由外而內，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亦不是絕不可能的事。

中國若要走向市場經濟，公有化工業將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棘手問題。

因現實利害而噤若寒蟬：而被反對的專制政府亦可能對情勢有所了解而作出讓步或缺乏應變而施以無情鎮壓：小農階級可因不同的政策變得異常保守或激進……。這些分合、變化、反應、消長，都不能抽象地作預先的類分或解釋，只能具體地作出微觀研究。

原始積累過程中出現大量官僚資本無疑令人憤怒，但我們亦不必對整個過程過度失望。應該反對的是腐化的專制官僚制度，並不是極待建立的私有化、個體化、市場化及法制化社會。玉石俱焚的反對絕不是發展的希望。宏觀而言，原始積累必會導致行動者對自身權利的全面覺醒，而覺醒後的行動者只要認清現實，在能掌握的條件下(不是盲目地)盡量推動專制政體的改造與轉化，由外而內，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亦不是絕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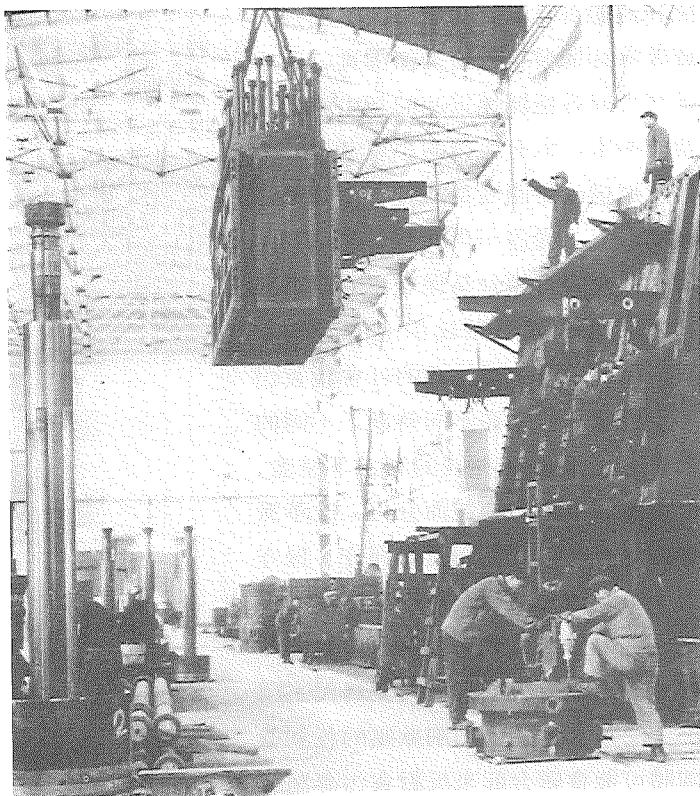
既非東亞模式也非德俄模式

若明乎上述分析，我們便不難發現，要了解中國發展的困難和出路，只能從中國社會內外形勢的互動中找尋，而不是倚靠「東亞模式」或「普魯士—沙俄模式」。〈下文〉清楚地指出了「東亞模式」的不可比性，但到頭來卻再以德、俄為對象，回歸到比較的取向上。如果東亞不可比，德、俄亦應不可比。與「東亞模式」一樣，德、俄與中國相似的地方雖多，但相異的地方也不少：

(一) 德、俄的發展始自十九世紀中葉，其時世界資本主義還在初興階段，資本流通及市場開拓較少限制，相對於中國今日身處的競爭劇烈、保護主義色彩深濃的成熟資本主義世界，不可同日而語。

(二) 德、俄發展之際，正是世界各國國家主義最蓬勃之時，而它們的專制式改革，多少亦是在這種世界性國家主義潮流和連綿不斷的戰爭壓力下催生的。改革的目的是社會的富裕，而是爭霸世界，改革的中斷或失敗，亦多少導源於對外戰爭的失敗^⑦。相反，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是內部引發的，而其外圍以至整體世界，大部分早已放棄國家主義，建立民主，同時亦希望中國走向民主。

(三) 德國在啟動發展之前，早因拿破崙法典的影響而「原則上全民平等，私人財產權獲得保障」，而拿破崙的大陸政策，亦扶助了若干工業，奠定了德國起初的資本主義工業基礎^⑧。另一方面，十九世紀的俄國基本上是一傳統的農業國家，毫無工業基礎，雖採行農奴制，但解放農奴終究簡單，亦容易受廣大農民支



持，正如沙皇亞歷山大自己承認：與其讓不滿的農奴自下而上打破這制度，不如由政府先行將它廢除^⑨。反觀中國，近四十年的公有化使工、農業均完全由中央控制計劃，市場不存。農業改革與十九世紀時俄國的情況大抵相若，比較容易進行，成效也易見。但已有相當基礎的公有化工業則千絲萬縷，互為牽纏，極難變動。自蘇聯解體出來的俄國採取激烈的私有化政策將近兩載，仍難有寸進，可見社會主義國家工業改革的艱難程度。

項列上述中國與德、俄不同之社會及國際條件，並不是要指出中國與德、俄不可比較，而是想要強調，任何歷史社會之比較，都有其先天的限制。抽象的模式，往往只有啟示意義，永遠不能代替個別社會的具體發展。在經濟與民主發展宏觀關係的啟示上，「東亞模式」，特別是「台、韓模式」，相信不會比「德、俄模式」薄弱：而就專制政權下權力與資本結合方面而言，「德、俄模式」必然予人深刻的印象。但若要用這些模式解釋甚至預言中國發展，內在限制亦相當巨大，例如：

(一) 60年代的台、韓有美國的護蔭，其專制政府可以大力壓制內部反對力量而不懼^⑩；但在世界日漸重視人權自由的今天，中共在處理內部反對力量問題上，便需要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了。

(二) 直到80年代初為止，台、韓的出口無條件地享有美國龐大的市場，而美國亦基於地緣政治因素，大力扶助台、韓的發展^⑪。今天中國的出口卻面臨美國多方的限制，而美國顯然亦懼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三) 十九世紀的德、俄可以利

用對外戰爭及殖民主義擴張緩和內部矛盾^⑫，今天的中共卻要直接面對內部的反對力量。

上述的限制可隨便舉得，而在這些縷述不盡的「條件性」、「環境性」限制外，中國發展與「東亞模式」和「德、俄模式」之最根本差異，相信是發展的起點，而不是〈下文〉所說的改革與發展之異質。在理論上強將改革與發展對立起來顯然並不符合事實。從歷史看，台、韓也有農業改革、工業改革，其深度與幅度也不可謂不大：另一方面，今天中國和十九世紀中葉的德、俄在改革啟動之後，亦有很快速的擴張與發展。但在這些國家中，只有中國是以一完全的公有化計劃經濟作為其發展的起點的。台、韓的起點是日本殖民地統治建立的資本主義倚賴經濟^⑬；德國是拿破崙大陸政策影響下剛具雛型的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經濟^⑭；而俄國則是傳統專制王朝統治下的農奴經濟^⑮。這起點的差異，使任何比較都帶有某種荒謬性質：中國到目前為止，仍在掙扎創造市場制度，而這掙扎是在十分龐大的公有化工業基礎上進行的。反觀50、60年代的台韓，以至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不但已有一定的市場基礎，也無中國公有化工業的龐大包袱。十九世紀的俄國，與其說近似今日的中國，毋寧說更近於晚清，起碼二者均是傳統的大帝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掙扎努力。

中國近四十年的公有化使工、農業均完全由中央控制計劃，市場不存。農業改革比較容易進行，成效也易見。但已有相當基礎的公有化工業則千絲萬縷，互為牽纏，極難變動。

還現實本來面目

以上種種分疏辯證無非想指出，要真正了解中國的發展，還是要回歸到中國內外形勢本身，歷史地、如實地分析國際力量、中共政權及中國社

會經濟條件和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交涉。事實上，客觀的世界經濟氣候、國際資本及技術流動、強國的主觀意向及政經政策、中共政權內部的權力分配、利益結集、對內外及自身形勢的掌握，以至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及社會內部各新舊力量的利益分佈、認知角度、處境感受等，均隨時相互激盪，從而左右中國經濟及政治發展的步伐和方向。這些複雜的變數與變化，絕不是某一抽象模式所能概括，亦不必與任何歷史社會盡同。它們只能透過宏觀與微觀分析的結合，從社會（國際和國內）結構及主體行動間的辯證關係中予以理解捕捉。

總之，要了解中國，最好的方法還是從中國及其身處的歷史形勢開始。這形勢包括外部已臻成熟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內部的一黨專政下的公有化計劃經濟。中國就在這兩大條件下進行原始積累，目的是藉原始積累建立跨向世界的市場經濟制度，以求全民富裕。基於此認識，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對『革命崇拜』與提倡妥協及非暴力」，以避免原始積累的中斷，亦要充分掌握現實條件以謀求社會的轉化與改造。

話雖如此，當我們真正處身於現實的歷史情境，對歷史現實的理性了解便不容易平服當下產生的情緒了。作為分析者和行動者，如何超越行動者的歷史限制，冷肅地還現實本來面目，然後再面對現實，相信需要巨大的內省能力和自制。特別當現實幽晦，分析者和行動者之間的辯證角色關係，便更難拿捏得準了。這不單是當局者之難，旁觀者又何嘗容易理清？

要了解中國，最好的方法還是從中國及其身處的歷史形勢開始。這形勢包括外部已臻成熟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內部的一黨專政下的公有化計劃經濟。中國就在這兩大條件下進行原始積累，目的是藉原始積累建立跨向世界的市場經濟制度，以求全民富裕。

註釋

① 原始積累這一概念曾一度引起頗多爭論，其中比較全面的解釋及分疏可參看柯志明的〈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89），頁179-85。

② ⑥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4), pp. 668; 724, 699.

③ Robert C. Tucker: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pp. 271-76.

④ 趙群：〈中國第四次經濟改革（1979-1989）芻議〉，《中國經濟改革》，徐滇慶、雷鼎鳴、張欣合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頁39-64。

⑤ 雖然中共一直誇耀其「領導」改革的歷史貢獻，但海外學者多認為那只是內外形勢迫着它如此走而已。陳一諮更明白指出，中共的農村改革只不過是承認了當時在安徽自動蔓延展開的農村變革的事實吧了。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1990），頁26-27。

⑦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1991），頁329。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81-99.

⑧ 註⑦，黃仁宇，頁316。

⑨ ⑮ 註⑦，Skocpol, pp. 85; 82-93.

⑩ ⑪ ⑬ Hagen Koo: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7; 167-69; 166-67.

⑫ 參註⑦。

⑭ 註⑦，黃仁宇，頁316-26。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